

# 在德里达与萨义德之间

## ——论解构主义与后-殖民批评底层逻辑的不可通约性

杨乃乔

**摘要** 从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都把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带入关于萨义德与后-殖民批评的讨论中。在这里，我们浓缩地概述了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以此不难发现，解构主义与后-殖民批评在双方的底层逻辑上两者相去甚远，其中有充足的理论文献可以给予实证。解构主义挑战的是本体界在场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哲学问题，而后-殖民批评抵抗的是现象界西方殖民与后-殖民宗主国以霸权实施的经验性地缘政治学的问题。我们给出了一个设问与回答：后-殖民批评要“解构”的“中心”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只要简单地抓住贯通西方哲学史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种中心主义，以其替换为西方殖民或后-殖民历史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学界即可以判定后-殖民批评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并且把解构主义认同为支撑萨义德与后-殖民批评的阿基米德点。这无疑是对萨义德与德里达的双向误读。

**关键词** 萨义德 德里达 解构主义 后-殖民批评 底层逻辑

作者杨乃乔，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福建福州 350108）。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5-0148-15

### 导言：是谁在德里达与萨义德之间贴上了可以通约的标签

萨义德是一位贴着“流亡”（exile）标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

1978年，萨义德凭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学者的身份推出 *Orientalism* 这部著作<sup>①</sup>，以对西方宗主国实施的殖民主义历史和文化及其地缘政治给予激烈的批评。<sup>②</sup> 这部著作协同萨义德对西方学界营造的东方主义话语进行挑战的反调之声，让他在国际学界声誉发闻，且经久不息。事实上，在西方学界长久以来，关于殖民、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研究的常态，而萨义德的颠覆性思考及其发出的逆耳声音，在灵魂的深处触动了西方学界，也因此引发了一众学者对他的追随与商酌。在事态随后持续10年的发酵中，萨义德及其追随者终于掀动了弥漫西方学界关于东方学、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讨论的理论思潮，

① 按：关于萨义德的 *Orientalism* 这部著作，汉语学界就其书名的翻译一直充满了争议。事实上，汉语学者无论把其翻译为《东方学》还是《东方主义》，都只是转码了萨义德赋予这部书名的一半学理内涵，都是以偏概全的翻译。在汉语学术传统中，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现成的概念，其既包涵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又包含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的“东方主义”；所以我在此直接使用英文源语“Orientalism”，以保留其两个层面之源语意义的共同出场，以规避仅滞留在汉语译入语的一个层面给予以偏概全的理解与解释。

② 按：我在这里只言指萨义德的 *Orientalism* 对“殖民主义”历史和文化的激烈批判，因为萨义德在这部著作中并没有涉及对“后-殖民主义”批评的问题。

其规模之大在充满龃龉的论辩中酿成了一桩国际学案。<sup>①</sup>

确实，在 *Orientalism* 出版 10 年后的西方学界，几乎是同期，有三部追随论述东方主义话语和后-殖民批评之读本的推出是让国际知识分子备受瞩目的。

1989 年，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斯·格里菲思（Ga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编撰推出了《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这三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白人学者。1990 年，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编撰出版了《后-殖民批评家：采访、策略、对话》（*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斯皮瓦克是颇具国际影响的印度裔美籍学者。1990 年，美国白人学者罗伯特·J. C. 扬（Robert J. C. Young）出版了《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此书在命名上直接借用了德里达解构主义（*déconstructivisme*）理论的一个重要术语“白色神话”——“*la mythologie blanche*”，以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给予了肇始于西方学界内部的激烈批评。

让我以准确的系年时间为事件发展的逻辑界标承上往下叙述。

当代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思潮的隔岸观火与接受向来极为敏感且迅速。《读书》在 1993 年第 9 期推出了三篇文章：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钱俊的《谈萨伊德谈文化》和潘少梅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此三篇笔谈以其前沿性的介绍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萨义德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热议的追风。历经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当下，关于萨义德及东方学、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讨论，一路成为汉语学界一众学者竞相论说且经久不息的话题。

反思西方学界与中国学界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学理本质性问题是特别值得提出来给予质疑的，即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几乎都达成共识：在理论的底层逻辑上，萨义德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在理论上是受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影响，而给予底层逻辑的支撑性建构的。于是中西学界在德里达与萨义德之间贴上了可以通约的标签。我在以下就这一认同著录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献予以概述性的反思。

我们只要翻阅一下 1989 年出版的这部读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轻松地巡检到以下类似的书写：

“后-殖民”（“*post-colonial*”）、“后现代”（“*postmodern*”）和“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是不恰当的标签，它们遮盖了广泛重叠的文学和文化实践。最近关于美国文化是否属于后-殖民（*post-colonial*）文化的争论使这一重叠过程更加清晰。虽然最近美国的批评模式深受欧洲的影响，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被美国批评家悉心采纳，然而美国人现在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已然同样地为语言和文化的颠覆观点提供了基础。与其把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视为解构中心的力量（*decentring forces*），视为破坏一种普遍权威的范畴，不如把它们看作美国文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颠覆性本质的证明：那就是对欧洲中心及其形式和期望值之权威的颠覆。<sup>②</sup>

不难发现，作者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在相当高的书写频度中，把德里达的名字及其解构主义的片断理论和术语，作为标签贴入自己的陈述中而使之频繁地出场。

1974 年，斯皮瓦克把德里达法文版的 *De la Grammatologie* 翻译为英文版 *Of Grammatology*，并且撰写了一篇体量宏大的理解与解释性“前言”，以此博得解构主义理论播撒者的名声而显赫于国际学界。在众所皆知的公共学术舆论中，斯皮瓦克被认同为德里达的追随者。斯皮瓦克在她编撰出版的《后-殖民批评家：采访、

① 按：我在这里使用的是“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这个概念，而不是“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与“*postcolonialis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萨义德、比尔·阿什克罗夫特、斯皮瓦克、罗伯特·扬及霍米·巴巴等，他们所操用的都是“*post-colonialism*”这个概念。关于“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学理内涵，我曾撰写过两篇文章给予甄别，一篇是《关于殖民、后殖民、后-殖民诸种相关概念的翻译与清理》一文，刊发于《中华读书报》2013 年 4 月 3 日，另一篇是《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美国东方主义及其中国话语研究——兼论后殖民、后-殖民等相关术语的清理》一文，刊发于《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年第 1 期。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移民者的隐喻》（*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Migrant Metaphors*）一书中对此也有界分性论述。

②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160-161.

策略、对话》读本中，收集了她与相关学者对话的 12 篇文章，其中多处出现德里达的名字，并贴满了解构主义理论话语的标签。这部读本中多位学者对斯皮瓦克的采访，也反复提及了她与德里达之间的学理关系。在《批评、女权主义和制度》（“Criticism, Feminism, and the Institution”）一文中，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学者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在采访斯皮瓦克时，即询问：“当你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关于德里达著作的讲座，这些讲座都很有争议。你是如何将德里达的著作置于这场论辩的背景中的？”<sup>①</sup> 这是 1984 年发生于悉尼大学的一次学术采访。

罗伯特·J. C. 扬是美国纽约大学朱利叶斯·西尔弗英文和比较文学的讲座教授，他的著作《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及书写的思维观念完全淹没于他对德里达思想的尊奉中，他对后-殖民主义及其批评理论的讨论的话语，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解构主义理论框架的注脚。让我们来阅读罗伯特·扬对“人种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批判的一段文献，以分析他是怎样把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作为标签贴入其中的：

这就是使德里达自己介入《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的语境。每一位理论家都知道那本书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批判；然而很少被想起的是，这些批判的术语所开启的宣称是关注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人种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构想。德里达认为，“这只不过是把自己强加给世界之过程中的最原始和最强大的人种中心主义”。正是这种关注解释了德里达对索绪尔特殊例子的选择和有力的质疑——索绪尔所关注的是他拒斥文字的“基础的人种中心主义”——卢梭（Rousseau）和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sup>②</sup>

不仅如此，罗伯特·扬在自己的论述还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带入其中，还包括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当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在观念的构成上也是对结构主义哲学的反动。在我看来，罗伯特·J. C. 扬关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性论述完全遮蔽于德里达的语境下，成为解构主义的传声筒及盲动者。

上述我引用罗伯特·扬在《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中的一段理论文献，其中涉及了德里达在《论文字学》这部著作中一开始即切入论述的“logocentrism”与“ethnocentrism”。这两个重要的术语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及随后而来的后-殖民批评中的确很常见。然而，“ethnocentrism”在这里存有着一个让人深思的隐含的误读与翻译的问题。请注意，这个术语在《牛津英语词典》（OED）中无论集成了几层意义，而其中两个基本的意义及其汉译是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用汉语的转码来表达，即：“人种中心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

我在这里把德里达《论文字学》的原文翻译如下，以对比罗伯特·扬的带入性论述：

这三段题记的意思不仅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种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上，这种人种中心主义在任何地方时时都在控制着书写的观念，也不仅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我所称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上：语音书写（例如字母）的形而上学，它在根本上——是神秘而又基质的原因，是简单的历史相对主义无法理解的——是最原始和最强大的人种中心主义，在把自己强加给世界的过程中，以同一秩序控制着世界。<sup>③</sup>

在此段的翻译中，我把“ethnocentrism”翻译为“人种中心主义”，以规避翻译为“种族中心主义”。德里达在《论文字学》的首句是先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术语而使用“人种中心主义”的，他在文字学的意图上旨在强调印欧语系下操用拼音语言进行言说与书写的白人种，以凸显西方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传统及其背后实施控制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关于这个术语的使用是出于哲学或文字学和语言学的意图，不可以理解为在讨论殖民主义或后-殖

①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Elizabeth Grosz, “Criticism, Feminism, and the Institution with Elizabeth Grosz,” i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6. 按：1984 年 6 月，斯皮瓦克访问澳大利亚，作为演讲嘉宾参加悉尼的一个关于后现代性讨论的会议。8 月 17 日，悉尼大学伊丽莎白·格罗兹对斯皮瓦克进行了采访，这篇文章发表于刊物《论纲第十一》（*Thesis Eleven*）的 1984/85 年第 10/11 期。

② Robert J. C.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50. 按：“这就是使德里达自己介入《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的语境”，这里的“语境”是指罗伯特·扬在上文引用的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Lévinas）的一段理论文献。列维纳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构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③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corrected editi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

民主义历史时，以据守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民粹主义（populism）的情绪上，所批判的“种族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之类。而罗伯特·扬及相关中西学者对萨义德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在挪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时，则把“ethnocentrism”误读和误译为了“种族中心主义”，以适应自己的思考与书写。

我注意到，任一鸣在翻译《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时，把罗伯特·扬引用德里达《论文字学》此段论述中的“ethnocentrism”翻译为“种族中心主义”。<sup>①</sup> 通览任一鸣作为译者的理解语境，她是遵循罗伯特·扬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因误读挪用而来的意图给予转码的。任一鸣是正确的。然而在理论的底层逻辑上，“种族中心主义”是完全无法还原于德里达此段源语理论思考的逻辑中的，其一定是错误的，并且隐含地成为一个在误读的挪用中多处误贴的标签。始作俑者罗伯特·扬是在挪用解构主义填补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时，偷换了概念。《孟子·梁惠王》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sup>②</sup> 我借用“仲尼曰”是想给出一个指涉性的隐喻表达：而事实上，在误读中挪用德里达的始作俑者，及这个被偷换的概念——“种族中心主义”，其后一并招摇着解构主义的旗帜，裹挟着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激烈情绪，在中西学界掀动了对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解构主义批判”，这哪里又是“其无后乎”？<sup>③</sup> 国际学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从众的惯性心理，当一位学人偶然把两位本不甚相干的理论家或两种理论思潮杂混地拼贴到一起，在误读中追求一个新的增长点时，一众学者即跟风而上，从不考虑双边理论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否具有本质上的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即解构主义与后-殖民批评在双方的底层逻辑上是否存有一个关联的阐释系统。于是一个在拼贴中影响与被影响的新的学术观点在误读与过度诠释中生成了，且在短期内即可以形成一脉思潮。

时值2008年，希腊雅典大学哲学院教授米娜·卡拉万塔（Mina Karavanta）和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尼娜·摩根（Nina Morgan）主编了一部论文集，直接把德里达与萨义德两位的姓名拼贴，组合为一部论文集的主命题，在剑桥学者出版社推出：《爱德华·萨义德与雅克·德里达：重建人文主义与全球混合》（*Edward Said and Jacques Derrida: Reconstellating Humanism and the Global Hybrid*）。

受西方学界的直接影响，中国学界也存有这样一种判断。

2011年，王宁、生安锋与赵建红推出了《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这部著作。王宁在这部著作的第六章《解构的影响与超越》中认为：“而且确实，三位蜚声世界的后殖民理论家都无法摆脱德里达的阴影，尤其是斯皮瓦克与德里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sup>④</sup> 这里的“三位蜚声世界的后-殖民理论家”是指被尊称为“圣三位一体”的萨义德、斯皮瓦克与霍米·巴巴。

中国学界关于萨义德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初始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历史转型期。那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触摸与接受还处在一知半解的朦胧状态，更不要说汉语学者猜测的萨义德以解构主义批评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centralism）之学说的正确与否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关学者对解构主义与后-殖民批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理论转换性判断，即：认为后-殖民批评把解构主义所颠覆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给予挪用，以其替换为西方中心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因此，双方在理论的底层逻辑上获有了影响与被影响的逻辑关系。那么关键问题是，除了罗伯特·扬以外，这三位以“圣三位一体”蜚声世界的后-殖民批评家自己是否如此认为呢？特别是萨义德？

至此，这里有必要以极简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一下解构主义与后-殖民批评各自的学理观念与底层逻辑结

① 按：此段翻译见于罗伯特·扬：《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②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见《十三经注疏》下册，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67页。按：“始作俑者”在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是一个具有贬义性修辞的表达，并非赞誉一事或一物的创始者。

③ 按：这里有一个拼音文字与汉字两者书写形态及其意义出场的差异性现象。无论是法语“ethnocentrisme”还是英语“ethnocentrism”，都是在一个概念的书写字面下包含着“人种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两个层面的意义。而作为汉语译入语，其恰然可以转码为两种不同书写的概念以给予文字上的区别，即：“人种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因此，无论是在法语“ethnocentrisme”还是英语“ethnocentrism”那里，偷换仅在一个文字术语下包含的两种不同指涉的概念意义，其更具隐蔽的误读性。然而在汉语译入语这里，无论如何，我们一眼即可从这两个概念字面上见出各自负载的学理意义。

④ 王宁、生安锋、赵建红：《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

构，以透视其双方之间在理论的本质是否具有可以互鉴的通约性，是否处在可以关联的阐释系统中。

### 一、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是抵抗逻各斯中心主义

我先来浓缩地分析一下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本质及底层逻辑结构。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新时期”，汉语知识分子在热议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批评时，一众学者几乎都是把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相提并论的，认为无论后现代主义理论波及的范域有多大，其核心理论是后结构主义，而后结构主义的核心理论就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因此，相关学者必然把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推送至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论域，视其为理论的底层逻辑支撑点。

既然如此，我确有必要精炼地概述一下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

首先在这里要宣称的是，德里达的思维观念所构建的解构主义，在理论上是纯粹的哲学问题，是为了解决哲学本体论（ontology）思维极限处的问题。无可否认，在挑战的标靶和理论的底层逻辑上，解构主义与文学艺术批评及其背景的审美文化没有多少直接的逻辑关系。而后来追随德里达的相关学者把解构主义给予在理论上的误读和变形的挪用，以推送于文学艺术批评，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等著述中，德里达殚精竭虑的逻辑思辨在于抵抗西方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传统，其理论的解构策略是指向借由逻各斯（λόγος/logos）作为普遍真理在信仰的推动下自明书写的西方拼音文字历史，并对其中在场形而上学的深层结构给予本体论上的颠覆，以解构“真理的历史”或“真理的真理的历史”在终极上所结构的先验（transcendence）权力话语。

关于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德里达在《论文字学》的第一编《字母之前文字》（“Writing before the Letter”）起始处就宣称得清清楚楚：

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历史，尽管有着差异，超越这些明显的限制，不仅从柏拉图（Plato）到黑格尔（Hegel）[甚至包括莱布尼茨（Leibniz）]，而且从前苏格拉底（the pre-Socratics）到海德格尔（Heidegger），形而上学的历史总是把普遍真理（truth in general）的起源归属于逻格斯（the logos）：除了我们将不得不解释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转向之外，真理的历史，真理的真理的历史，通常是书写的贬值（the debasement of writing），是“全部”言说（speech）之外所压制（repression）的历史。<sup>①</sup>

就德里达在此段论述中所表达的理论思想，这里有必要给出一个梳解。德里达在此段书写中使用的“书写”——“writing”这个术语，其指涉的就是铭刻（inscription）的文字，或文字编码所结构的文本，而历史正是凭借文字之书写编码为文本，得以存留为物质性的铭刻。并且德里达在这部著作第一编命题“Writing before the Letter”中使用的“letter”，并不是指称已经书写为文字的“字母”，而是指称作为口语“言说”——“speech”的语音字母。

德里达的《白色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是一篇极富启示性的重要文章，其中德里达就“什么是形而上学”给出了自己的设问和回答：“什么是形而上学？一个聚集并反映西方文化的白色神话：白人（white man）把他自己的神话（即印欧神话），他的逻各斯——即他的习语的神话——认为正是他不可逃避的愿望所呼唤理性的普遍形式。要逃避这个白色神话是很不容易的。”<sup>②</sup> 德里达的设问与回答涉及了三个在学理逻辑上可以通约的重要术语，即：形而上学、白色神话与理性的普遍形式。在《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一书中，罗伯特·J. C. 扬也正是以此挪用了德里达的“白色神话”这个术语，为自己讨论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作为批评理论的逻辑支撑点。其实，这无疑是一个误读性的挪用。

①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corrected editi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 按：斯皮瓦克英译的 *Of Grammatology* 第 1 版推出是 1974 年，第 2 版是 1976 年，而我选择使用的版本是 1997 年的第 3 版。我认为这个版本最好。

② Jacques Derrida,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ol. 6, No. 1, On Metaphor, 1974, p. 11. 按：德里达此篇文章的法文原命题为“La mythologie blanche”（《白色神话》），最早刊发于《诗学》（*Poétique*）1971 年第 5 期。

在西方哲学史上，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生命诠释学（Hermeneutik des Lebens）以来，历经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Phänomenologie）的现象是本质直观，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论诠释学（ontologische Hermeneutik），一直存在着一脉抵抗及拒斥先验之终极真理的本体论思考。当然，这三位是生存于德语区的哲学家。而德里达正是在海德格尔以“此在”（Dasein）对“存在”（Sein）作为先验真理之意义——逻各斯进行颠覆的启示下，他在法语区凭借哲学（philosophy）、语言学（linguistics）、文字学（grammatology）、词源学（etymology）、语文学（philology）和修辞学（rhetoric）等综合性的分析视角，对印欧语系的拼音语言给予了意义（meaning）—言说（speech）—书写（writing）的等级序列（hierarchy）划分与思考，其理论目的是为了解构一个由逻各斯中心主义控制的宏大的在场形而上学传统，也是为了解构内化于西方依凭语音中心主义书写的历史传统中的终极真理及其独断论（dogmatism）的权力话语结构。在德里达看来，由逻各斯控制的在场形而上学即是在语言学意义上由白人操用印欧语系的拼音语言以书写铭刻的白色神话。

思考至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直接阅读德里达在《白色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中自己对“白色神话”的设问与界定：

什么是白色神话？正是形而上学自身抹去了的寓言场景（fabulous scene），寓言场景将形而上学以白色墨水（white ink）铭刻（inscribe）为一幅覆盖于叠加本（the palimpsest）之上的隐形图画（invisible drawing），而寓言场景依然保留着活性和激跃。<sup>①</sup>

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语音中心主义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把两者描述为投射终极缘光的太阳。太阳在本体界播撒的终极缘光，就是照亮现象界作为终极真理的普遍意义，是控制西方古典哲学传统的宏大隐喻（metaphor）。德里达言指的“寓言场景”即是终极缘光以隐喻投射的意义，其构成了理性的普遍形式，也即柏拉图洞穴理论的向阳式隐喻。理解至此，我们应该再去阅读一遍罗伯特·扬书写的那部颇具影响的《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不难发现其对德里达“白色神话”及解构主义理论术语的误读性挪用，以编织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话语，在理论的底层逻辑上不知道偏离到哪里去了！当然，在中国人文学界，关于对萨义德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鼓噪及其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挪用，也更是存在着如此北辕适楚的现象。

这里有一个精致的理论逻辑点，我认为是有必要释义清楚的，否则就是一段无效的文字书写。德里达在上述所言的“除了我们将不得不解释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转向之外”，这里的“除了……转向之外”是指称海德格尔之存在论诠释学等力图重建现代形而上学的哲学目的论，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不主张重建现代形而上学的，即不主张对传统的本体与现象二元对立之形而上学结构给予解构后，重构（reconstruct）一个颠倒的现代形而上学本体论。

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一书中指出，在借由拼音文字铭刻的西方历史传统中，于本体论上存在着一个先验及独断论的终极语音——逻各斯，逻各斯是先验的普遍真理之“意义”——“meaning”的源头，在哲学的极限处，逻各斯是投射终极缘光之先验的终极“能指”——“signifier”；而“言说”——“speech”是受动于逻各斯之真理意义控制的显现，即“在场”——“presence”，是“所指”——“signified”；而“书写”——“writing”又是受动于“言说”——“speech”的控制，从而显现为铭刻的拼音文字记录，也即“在场”——“presence”，也是“所指”——“signified”。因此德里达判定，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其本质是：文字作为铭刻所结构的文本，最终构成了文字历史，其作为“所指”必然受到终极意义之“能指”的限制而受控于先验的逻各斯。

当然，“言说”是距离先验真理之“意义”最近的在场或显现，而“书写”隔着一层“言说”，是距离先验真理之“意义”具有间隔性的在场或显现，所以在书写铭刻的文字与真理的“意义”之间必然会产生“差异”——“différance”。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ol. 6, No. 1, On Metaphor, 1974, p. 11. 按：用“白色墨水”写在白纸上，虽然无法看见白色的字迹，但可以看到笔尖铭刻在白纸上书写印记，因此德里达称之为“叠加文本”。

这也是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所指认的在文本之前存有一个先验真理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代，阅读和写作，符号的生产或解释，通常作为符号结构的文本，允许自己受限于从属性（secondariness）中。因为文本之前已有一个真理（a truth），或一个意义（a meaning），其已由逻各斯的元素（the element of the logos）构成并在其中。”<sup>①</sup> 请学者务必注意德里达在此之如是说。

转换一句表达，无论是言说还是书写，他们背后在理论上应该负载且出场或呈现的意义，是由逻各斯—太阳—神的先验权力话语在隐喻中所给予的播撒，而书写作为铭刻，距离作为真理的终极意义最远。这里作为书写的铭刻也即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一书在开场首句陈述中所隐指的楔形符号（cuneiform signs）：“一个在书写的科学中发光的人，将如同太阳一样发光。一个抄写员。（A scribe）噢，萨玛斯 [太阳—神（sungod）]，你将你的阳光照亮全部大地，宛如楔形符号。”<sup>②</sup> 在此，也就可以通透地理解德里达开场首句的隐指意涵。

我们从中可以见出德里达对印欧语系拼音语言所给出的关于意义—言说—书写之等级序列划分的理论策略。而德里达则指认书写恰然是嵌放于在场形而上学历史结构的意义与声音之间，使意义延缓出场且产生差异的衍生物。德里达正是以此策略解构了借由拼音文字书写的一部西方历史的深层结构，因为书写是对逻各斯之普遍真理意义的遗忘，导致以拼音文字铭刻的西方历史结构瞬间坍塌。让我们再来阅读德里达在《论文字学》第一编《字母之前文字》中的一段陈述：“书写是对自我的遗忘，是对自我的外在化，是与内在化记忆的相反，是对打开精神历史之内在化记忆的相反。”<sup>③</sup> 我认为，这也必然涉及从解构主义视角对历史学及其研究给予挑战的重要理论立场问题，即：书写是对逻各斯之真理意义的自我遗忘。如此这般，我们可以更为递进一步设问：那么以文字书写的历史其真实性又在哪里？再强调一遍，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体系中，书写与铭刻是两个共属概念。

无论是从事哲学理论研究还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我们一定要把握其中具有共同属性的理论概念在意义的关联中给予替换性的理解。德里达在这里使用的概念“自我”与“精神”，所指称的就是作为先验终极真理的逻各斯。在场形而上学受控的终极意义作为“能指”，就是逻各斯，是先验真理之“自我”与“精神”的内在化记忆。如此而言，言说者——人的主体性在本质上被逻各斯的权力话语所控制。在《白色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一文中，德里达在讨论逻各斯作为最高存在的隐喻时，也反复在提示追问理论概念之间关联意义相互阐释的重要性：“哲学的论题属于一个阐释系统，其中隐喻（metaphora）、摹仿（mimesis）、逻各斯（logos）、自然（physis）、语音（phoné）、意义（semainein）和命名（onoma）是关联在一起的。在《诗学》和《修辞学》第3卷中，我们为了呈现这些论题关联的本质，必须考虑关于隐喻讨论的位置。”<sup>④</sup>

我们也来追问以下诸理论概念之间可以相互阐释的共属关联意义：书写作为衍生的铭刻符号（符号的符号），其恰然是对“自我”与“精神”的遗忘，书写作为字母的铭刻符号是一种外在化形式。注意：在上述的论辩中，“逻各斯”“太阳”“神”“隐喻”“自我”“精神”“语音”“真理”“意义”与“能指”是殊两悉称的共属本体论的终极逻辑概念。在本体论上，逻各斯作为先验的普遍真理以一种权力控制着言说，言说又以一种权力控制着书写。而问题的严重性是，逻各斯在历史学的意义上，控制着书写铭刻的文字历史。

思路陈述至此，我们不妨再来阅读《批评、女权主义和制度》这篇文章，其中一段涉及到斯皮瓦克对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后结构主义的学理不会把历史视为一系列原初的事实，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的叙述。德里达曾给出过这样一个表述，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对西方历史叙事基础概念的解构（deconstitution）。”<sup>⑤</sup> “解构主义是对西方历史叙事基础概念的解构”，此句表达

①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corrected editi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4. 按：汉语学界往往也把“差异”——“différance”翻译为“延异”。

②③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corrected editi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 p. 24.

④ Jacques Derrida,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ol. 6, No. 1, On Metaphor, 1974, p. 31.

⑤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Elizabeth Grosz, “Criticism, Feminism, and the Institution,” i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31.

是汉语知识分子必须了然于心的关键逻辑点。

在这里，我们不妨转换一个逻辑视点来判断。德里达是崇尚文字书写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书写”《论文字学》一书的要义所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策略即旨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之权力性真理意义的结构给予颠覆性的解构，因此在理论的推导逻辑与修辞学的策略上，他推论衍绎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法语概念，即在“constructivisme”这个术语前增加一个否定性“词头”“dé”，从而创制了“déconstructivisme”即“解构主义”这个术语。这是一个在西方学界结构主义后期也即现代主义晚期曾风靡一时的热点学术概念，掀动了弥漫于国际学界关于解构主义哲学理论思潮的大讨论，美国学界的“耶鲁四人帮”对德里达之解构主义的无缝跟进及鼓噪，足以见证这一点了。

德里达在《我思与疯狂史》（“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一文中提及哲学与政治的隐喻或形而上学的逻辑关系时，曾有这样一句供述：“哲学领域是在某一结构的整体中，如同政治领域的隐喻或形而上学进行功能的运作。”<sup>①</sup> 不错，正是在这个学理意义上，解构主义也必然波及政治学与伦理学，也势必殃及国际学界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及其研究。

需要提醒的是，我在这里只是为了求证后-殖民批评与解构主义双方在底层逻辑上所属的差异性立场，是为了求证德里达与萨义德之间是否存在理论观念的通约性，因此只要以极简主义的思考把解构主义的理论构架及策略浓缩清楚，一切也就明晰地反差出来了。我没有足够的兴趣专论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但还是再来追问一下德里达关于“表达”——“言说”是先验逻各斯之普遍真理意义外在化的论述。

在《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Introduction au problème du signe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一书的第三章《作为独白的意义》（“Le vouloir-dire comme soliloque”）中，德里达曾有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理论陈述，与我以上浓缩性陈述的问题是紧密关联为一体的：

表达（ex-pression）就是一种外在化（extériorisation）的过程。它（表达）把首先存在于某个“内部”的意义（sens）挤压（imprime）到了某个“外部”。<sup>②</sup>

请注意德里达在这里使用法文书写时，在术语创制与修辞策略中所刻意把玩的思想性、深刻性与精致性。无疑，德里达是解构主义者，但是，他也在“建构”自己的解构主义理论；如同海德格尔在抵抗在场形而上学时也在建构他的存在论诠释学理论一样，以“Dasein”替换“Sein”主张重建现代形而上学。应该给中国汉语学者有所启示的是：两位哲人都在词源学、修辞学与语文学上以厚重的学养智慧做足了文章。

德里达在创制与操用“ex-pression”这个术语时，在构词法上是以分隔符号“-”对“expression”——“表达”进行两个部分的拆解。从词源学的角度来分析，词头“ex”具有“外”的意涵，而“pression”又具有“压力”和“压强”的意涵。德里达在创制“ex-pression”这个术语时，其修辞策略和理论目的是与“expression”词义中一个早出的基础义项“从一个实体中抽出它所包涵的液体”形成关联逻辑的呼应。<sup>③</sup>

我始终认为，德里达创制与操用这个术语的理论目的在于：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控制的在场形而上学传统结构中，所谓“表达”——“ex-pression / expression”，就是让初始于终极语音的内部意义因其本体论的“压强”和“挤压”而得以释放到外部，即显现或在场（present）为“外在化”（extériorisation）的“声音”，

① Jacques Derrida, “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 in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Alan Bass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7, p. 40.

② 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Introduction au problème du signe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 *Quadrige*, 1993, p. 34. 按：我在这里谈一下关于法文“imprime”汉译的动机。动词“imprimer”对应的名词形式为“impression”。在这里，“impression”首先指称“在物体表面按压、挤压”之义，但它也有一个引申义，即：“通过施与压力而使一物在另一物表面显示出痕迹”。再度引申下去，它指涉的就是我们常然所说的“（留下）印象”。因此，在这里我们把法文“imprime”汉译为“挤压”，同时也与“ex-pression”的“pression”——“强压”在意义的逻辑上呼应。德里达以“白色神话”喻指的叠加书写即是如此。从中我们目睹德里达在理论思维的密度中操用术语的修辞讲究及其深刻性与精致性。

③ 按：参见《法兰西学院大辞典》（第9版）（*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Neuvième Édition）第2卷，“impression”词条，网址：<https://www.dictionnaire-academie.fr/article/A910461>，2024年4月5日访问。

即：“表达”或“言说”——“speech”。<sup>①</sup>这就是逻各斯的“独白”——“soliloque”！在语言学的维度上，先验的终极语音是“能指”——“signifier”，而“表达”则是“所指”——“signified”。具有权力话语压强和挤压的内部意义就是终极语音——逻各斯在场之普遍真理的“独白”，“声音”“表达”“言说”恰然就是受动于终极语音——逻各斯之先验普遍真理意义施压的外在化过程。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在场——显现，也是为什么西方学界把其称之为“metaphysics of presence”——“在场的形而上学”或“显现的形而上学”。<sup>②</sup>这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作为哲学极限处的终极能指——隐喻，在本体论上对作为所指的“言说”与“书写”进行权力的控制。

我特别注意到，莱昂纳德·劳勒（Leonard Lawlor）在把德里达的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Introduction au problème du signe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翻译为英语读本时，他对此句的翻译也是颇为讲究的：“Expression is exteriorization. Expression imprints in a certain outside a sense which is discovered first in a certain inside.”<sup>③</sup>就前一句的主词，他保留使用了德里达创制的“ex-expression”这个术语，而关于下一句的主词，他没有使用相对应于法文阴性代词“Elle”的英文代词，以指代“ex-expression”，而是直接使用了“expression”作为主词。无疑，莱昂纳德·劳勒的翻译与理解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准确理解后的翻译，而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转码。

在法语原文中，德里达在创制和操用了“ex-expression”后，下一句则是使用阴性代词“Elle”以指代“ex-expression”的，所以阅读法文原文的此句时，理解的难度较大。

我们必须准确地捕捉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哲学思路的踪迹。实际上，在德里达的思路中，“Elle”在语法形式上虽然应该指代的是“ex-expression”，但在隐含的修辞内涵和理论目的上，其必然指代的是“expression”，以在德里达自身的内心思考中呼应他所创制的“ex-expression”，即：这是一个源自哲学极限处具有“压力”或“压强”从内向外释放的“expression”——“表达”或“言说”。于在场形而上学的传统中，那就是逻各斯作为先验真理以终极意义的隐喻角色在“独白”，即：逻各斯在“言说”，逻各斯在“书写”，逻各斯在“隐喻”。

翻译无疑是一种理解与解释，我们从这一翻译的细处及一个译入语修辞的择取，可以见出莱昂纳德·劳勒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策略理解与翻译的准确性及其深厚的学养。

如果一位学者全然没有准确地理解德里达创制“ex-expression”这个术语的修辞内涵、构词意义和理论目的，那必然是无法体验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策略的，同时，也无法理解先验的逻各斯在本体的终极上以隐喻所向外释放和显现的源自内部的施压权力性表达。其所收获的只能是一种在无效阅读中所遭遇的意义缺席（absent）的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结果是好像人人都在奢谈德里达与解构主义，其实一无所是！

严格地讲，“ex-expression”是一个哲学观念的文化负载词，其无法被直接翻译为汉语译入语。因为在汉字思维的哲学思想语境中没有发生过这种逻辑观念，所以也就没有形成对应的汉字书写。倘若学界一定要直接把“ex-expression”翻译为“表达”，那就全然失去了德里达创制与操用这个术语的“内在”用心良苦，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予诠释性的阅读与梳解，如此才可能准确地拿捏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

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我在这里必须著录，从而文本化为一段当代中国学术的文献史记忆，以规避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忘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界学者对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所投入的兴趣与激

① 按：在汉译本《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的第三章《作为自白的“意谓”》的第三段，杜小真把此段中一句重要的表达“L'ex-expression est extériorisation”的意义译反了，错译为“表达是内在化过程”，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表达是外在化过程”，这就吻合于德里达为语音中心主义所划分的关于意义——言说——书写之等级序列的逻辑。因为，“声音”“言说”“表达”是自律地受动于终极语音逻各斯之普遍真理意义的推动，是逻各斯之终极意义在本体论上外在化过程中的“独白”——“soliloque”。见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页。

② 按：把“metaphysics of presence”汉译为“在场形而上学”，这里的“在场”的汉译是非常愚拙的，太拘泥于英语词典的字面意义硬译了。

③ 按：关于莱昂纳德·劳勒的英译见于 Jacques Derrida, *Voice and Phenomeno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Sig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Leonard Lawlor(trans.),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7.

动，其鼎沸的情绪远远超越了哲学界之学者讨论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声音，尽管他们一定并不比哲学界之学者更懂得解构主义在理论上所要抵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语音中心主义，并不懂得德里达的理论欲望在于解构本体论最高意义统摄下以拼音语言书写——铭刻的一部西方文字历史传统。

解构主义与后-殖民批评在双方的底层逻辑上即无法关联于一个共属的阐释系统。

## 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底层逻辑是地缘政治学

浓缩地解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目的是为了推动解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在双方的理论底层逻辑之间形成一个比较的参照，以见出两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即无法关联于一个共属的阐释系统。我在这篇文章前后描述性地著录了萨义德及其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历史背景，其中也涉及了殖民主义及其批评的相关历史元素。这都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殖民与被殖民之间所遭遇的经验历史。

较之于哲学思辨的体系构成，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无疑是锚定哲学本体论的极限处，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抵抗性的反动，是本体界先验哲学的问题；而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个概念负载的理论内涵，则是关涉国际地缘政治及其背景历史、宗教、经济、战争、文化与科技等问题，是现象界的经验历史问题，其中绝然没有类似或可以通约于拒斥西方在场形而上学的那些哲学观念的构成元素。两者无法构成互鉴的参照，所以也更不可能在同一个维度上构成具有共通理论的底层逻辑！关键是，在理论上，经验历史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全然没有源自先验哲学体系构成及其底层逻辑的思辨，其中那种缘发于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情绪，在经验历史中的仇视与宣泄，全然压倒了抽象的理论思辨张力。归根结底，抵抗东方主义的话语及对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还是一种关涉经验历史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第三世界诉求。因此，我始终认为对后-殖民主义抵抗的话语，其更是一种地缘政治学与历史学的批判，没有多少理论，更不是一种哲学的思辨理论。但我姑且还是将其称之为后-殖民批评，然而两者的理论形态存有本质上的差异性。

在上述反思和分析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策略后，一切都清晰无比：无可争议的是，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与后-殖民批评的底层逻辑两者相去甚远，双方缺失关联阐释的系统。解构主义反动的是本体界在场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哲学问题，而后-殖民批评反动的是现象界西方殖民宗主国以霸权实施的经验性地缘文化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的问题。

我在这里不妨给出一个反思性的设问：后-殖民批评要“解构”的“中心”是什么呢？是不是只要简单地把通贯西方哲学史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替换为西方殖民或后-殖民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再把“中心”与“边缘”这两个概念作为标签贴上，学界即可以有理由判定后-殖民批评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并且把解构主义认同为支撑后-殖民批评的阿基米德点。我想提醒的是，在理论的思辨性质上，学界千万不能把各自源出于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两种话题和各自源出于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的两种历史相混淆，两者之间不可能具有调和与比较的学理性，所以也没有本然存在且可以调和填补的鸿沟。这完全不同于康德哲学在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的调和性思辨，即以审美的《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 去调和《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 与《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1788)] 之间各自论述完毕后所遗留下的思想鸿沟。

那是两码事！

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前言”中，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曾有一段让汉学学者在观念上不断重复的书写：

换言之，最初把后-殖民世界（the post-colonial world）贬低到“边缘”（“margin”）的异化过程转向了自己，并凭借一种精神分界线把这个世界推入了一个所有经验都可以被视为非中心的（uncentred）、多元的和多样化的位置。<sup>①</sup>

在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看来，是西方把后-殖民世界在异化的过程中推向“边缘”的，而这一异化的“边缘”

①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12.

过程反过来让后-殖民世界自己蜕变为多元且多样化的“非中心”。在《与萨义德对话——比尔·阿什克罗夫特采访》（“Conversation with Edward Said. — Interview by Ashcroft, Bill”）一文中，<sup>①</sup>萨义德也反复使用“margin”——“边缘”这个术语，不错，德里达是有一部论文集《哲学的边缘》，但萨义德关于边缘的提及，在学理上与德里达抵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完全不在一个通约的关联理论阐释系统中。对两种理论系统之间是否存在影响与接受之现象的判断，一定不可以把阅读的注视仅仅囿限于双方文字书写的表象上，以硬性的类比抓取那些字面书写相同的概念，而是必须要沉入双方理论系统的底层逻辑中追问是否可能的通约性。

我一直认为，既然是理论就必然有其自洽且完整的结构系统，理论就自身完整的系统而言，一定有其内在的深层逻辑结构，任何一种理论的概念提用，都必须把这个概念维系于理论系统的深层逻辑结构中，给予概念及其深层逻辑结构关联意义的同步提取与理解，然后才能使用或挪用。任何一位学者都不可以把一个概念完全抛掷于它本来生成且依附的理论系统之外，给予意义的剥离，仅从孤立的观念字面上提取望文生义的误读意义，进行生硬的牵经引礼的理解与解释。倘若如此，那真的成了后现代主义碎片式的符号拼贴了。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从 20 世纪“新时期”“后新时期”到当下，弥漫于中国人文学界的西方多种理论批评思潮也正是如此拼贴且扑面而来，成为鲁莽主义（recklessness）的学术产物。

在中西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后-殖民批评在理论上深受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之理论策略的影响，王宁在《超越后现代主义》的第三章《后殖民理论与文学》曾有以下的一段陈述，具有代表性：

实际上，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与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是交错进行的，而且，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主要理论课题，也包括在后结构主义层面上的后现代主义的所谓“不确定性”和“非中心化”等，有着明显的批判和“解构”倾向。<sup>②</sup>

并且王宁进而认为：“此外他们从德里达那里获取了解构主义的理论与阅读策略”，<sup>③</sup>“这些明显带有‘非中心化’和‘解构’倾向的理论均对他们的后/反殖民主义思维方式和阅读策略不无影响，使这一理论话语作为一种对抗性的话语策略得以在北美的多元文化主义社会存留下来。”<sup>④</sup>

这样一种理解与解释的现象在中西学界的确是存在着的，我自己曾经也持有这样一种判断。无论是萨义德还是比尔·阿什克罗夫特、斯皮瓦克、罗伯特·扬与霍米·巴巴等，或者是后-殖民批评，其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或后-殖民主义者肇事的国际地缘文化政治问题所给出的批判充满着挑战的张力，甚至是外溢出暧昧的仇视。特别是“圣三位一体”的理论蓄势姿态及批判话语在修辞的择用上尤其尖锐，其修辞色彩容易把相关中西学者对他们的理解和判定追问至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那里去。

这很有意思！让我们来阅读以下两篇西方白人学者撰写的文章。

在《“另外一种坚持”：人文主义与共同体的困惑》（“‘Another Insistence’: Humanism and the Aporia of Community”）这篇文章中，米娜·卡拉万塔和尼娜·摩根首先阐明了萨义德与解构主义批评无关，这是不错的，但然后又把萨义德在话语策略上嫁接到解构主义那里：“尽管萨义德的态度与解构主义批评（deconstructive critique）无关，但他自己的词语表明了一位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对于批判性探究的挑战。”<sup>⑤</sup>问题是，萨义德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位后结构主义者或解构主义者吗？或萨义德愿意承认自己对西方之东方主义话语的抵抗性批评是建基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上的吗？萨义德傲慢得很，他已经否认了！

我们不妨来阅读王逢振 1987 年在美国对萨义德采访所撰写的文章《“独抱冰霜有性情”的爱德华·赛义德》，体验一下其中一段萨义德对德里达及解构主义的评价：

由于我知道在厄湾加州大学我将见到分解主义的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和雅克·德里达，所以我特别询问了他对分解主义的看法。他说：“这几年许多人都在做分解批评。你去的厄湾可能会取代耶鲁成为分解批评的

① Edward Said, “Conversation with Edward Said. — Interview by Ashcroft, Bill,” *New Literatures Review*, Issue 32, 1996, pp. 3–21.

②③④ 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38、39、40页。

⑤ Mina Karavanta and Nina Morgan, “‘Another Insistence’: Humanism and the Aporia of Community,” in Mina Karavanta and Nina Morgan (eds.), *Edward Said and Jacques Derrida: Reconstellating Humanism and the Global Hybrid*,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p. 334.

中心，希利斯·米勒一直都在谈解构主义。但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拘泥于学院式的特殊的東西。你很难想出解构主义产生过什么伟大的作品。它为许多人造就了职业和名誉，但很难想出有谁写出过重要的著作。保罗·德曼是个例外，但他已经逝世。当然还有雅克·德里达。可是你看看美国的情况，解构主义有哪些重要的作品呢？我自己是想不出来的。但不少人做解构主义的批评却是个事实。”<sup>①</sup>

此段中的“他”就是“萨义德”。另外王逢振在这里使用的术语“解构主义”即是“解构主义”在80年代末的另外一种汉译。王逢振在这篇访谈文章中著录了萨义德对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轻蔑。

这位来自近东巴勒斯坦的精英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放弃尊严，把自己思想的立论权力拱手交给法国学者德里达而屈就自己呢？尽管德里达出生于伊斯兰文化属地阿尔及利亚，但那里曾是法国的殖民属地，德里达誉满国际学界的名望是以法国哲学家之身份而沾沾自炫的。

在 *Orientalism* 这部著作中，萨义德始终对老牌殖民宗主国——法国和英国投以强硬的反调之声，当然还包括美国：

我的观点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源于英国、法国和东方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紧密经历（closeness experienced），直到19世纪早期，这种紧密经历事实上只是意味着印度和圣经的土地。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和英国控制了东方和东方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又主导了东方，并以法国和英国曾经的方式处理东方。我称之为东方主义者（Orientalist）的大量文本就是从这种紧密经历中产生的，尽管这种紧密经历的动态（dynamic）总是显示出西方（英国、法国或美国）比较强大的力量，然而是非常具有生产性的。<sup>②</sup>

从这段引用的文献中，我们可以见出萨义德的对法英美三个殖民宗主国的拒斥姿态是彻底的。*Orientalism* 这部著作特别把法国及其殖民行径寻弊索瑕地从头批到尾。

威廉·V. 斯帕诺斯（William V. Spanos）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哈姆分校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他曾撰写过《爱德华·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美国例外论：9·11事件后的拷问》（“Edward Said’s Humanism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 Interrogation after 9/11”），其中有以下一段表述：

正如赛义德所暗示的那样，如果后结构主义者（the post-structuralists）对人类自主能力的可能性是过于悲观的话，那么也可以说，鉴于西方社会中知识/权力关系（the knowledge/power nexus）的普遍认同，赛义德对这些可能性也过于乐观了。尽管如此，把后结构主义理论说成决定论（determinism），未免过于简单化了。<sup>③</sup>

言下之义，威廉·V. 斯帕诺斯认为萨义德并不认同后结构主义者，所以他继而言之道：“我认为，赛义德的严厉批评并不适用于后结构主义理论；更确切地说，是对它的滥用（abuses）。”<sup>④</sup>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相关西方源语理论文献阅读量的增多，我逐渐意识到，德里达与萨义德并不是中西学界众说纷纭的“沉芷澧兰”。在这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使用“沉芷澧兰”这个典故的取喻。

“沉芷澧兰”见于《楚辞·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sup>⑤</sup> 东汉古文经学家王逸对此句注为：“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sup>⑥</sup> 我在这里主要是营造两个维度的隐喻，以指涉萨义德和德里达生存的地缘与人格。首先，我取喻于一个同属地缘的概念：沅水与澧水流经于同一区域——湖南，其次取喻于“芷”与“兰”，因为两者同如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所喻称的秉有“闲识孤怀”的人格。不错，德里达与萨义德都是“异于众草”的精英知识分子，然而，他们恰然是代言西方和东方两岸不同区域各自为阵且风马牛不相及的知识分子。

在《爱德华·萨义德与雅克·德里达：重建人文主义与全球混合》中，米娜·卡拉万塔和尼娜·摩根作为两位主编，在取用萨义德与德里达的名义下仓促集结了13篇文章，以借名讨论人文主义（humanism）与后-西方人文主义（post-western humanism）等问题。我耐心十足地把这部论文集翻阅完毕后，只是收获了一种

① 王逢振：《“独抱冰霜有性情”的爱德华·赛义德》，见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十四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53页。

②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78, p. 4.

③④ William V. Spanos, “Edward Said’s Humanism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 Interrogation after 9/11,” in Mina Karavanta and Nina Morgan (eds.), *Edward Said and Jacques Derrida: Reconstellating Humanism and the Global Hybrid*,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p. 28, p. 29.

⑤⑥ 屈原：《九歌·湘夫人》，见屈原著，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5页。

别无选择的另类感受：两位欧美学人乱点鸳鸯谱地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萨义德与德里达拼贴于一个文本空间中，以企图重建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后-西方人文主义什么的，并且还涉及了杂乱无章的其他事，如美国的“9·11”事件等，最后还美其名曰：这是一种“the Global Hybrid”——“全球混合”。我的理论直觉是，这哪里是什么“全球混合”，分明是“全球杂混”。这里牵扯到我在翻译时所择取的汉语译入语的修辞立场问题。这，当然就是我的翻译立场！

我始终认为，从事理论研究不仅需要严谨的抽象逻辑思辨，也更需要一种遭遇理论时瞬间体验的悟性直觉，这是一种经年积久的学养所在。我一直存有一种理论的感觉，从理论的外延与内涵来解析，后-殖民批评所指涉的标靶，其外延可以特别的宽泛，因此内涵也就相应的特别稀薄。外延与内涵的比值是形式逻辑的本质问题，为此我不再赘述。后-殖民主义批评只要是与“文学艺术”或“文化研究”沾边，就可以一网打尽其中诸象，给予怎么都行的强制阐释。然而佛语的“诸象非象”最终要触及的是诸象的内在本质，而解构主义在理论上作为纯粹的哲学所指向的挑战标靶，一旦脱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在场形而上学背后的二元对立结构，其理论全然失去了挑战的标靶而在逻辑上不再奏效。晚近 30 多年来，汉语学者仅仅抓取“解构”“颠覆”“中心”“边缘”“踪迹”“播撒”等若干汉语译入语作为标签，无论把这些标签贴向哪里，哪里便即刻失去了地道的解构主义及其论述的本质性内涵，所收获的充其量也只是拼贴与杂混的似是而非罢了！

还是让我们以准确的系年时间为事件发展的逻辑界标。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汉语学界关于后-殖民批评的热议，其中关于斯皮瓦克翻译德里达 *De la Grammatologie* 一书的学案，曾对我也有过影响，我在这里不妨多谈几句，以再度备份于学界。

王宁在上述指出“斯皮瓦克与德里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落实到具体的学案则是言指斯皮瓦克把德里达法文版的 *De la Grammatologie* 翻译为英文版的 *Of Grammatology*。在这里，我不妨再度梳理一个当代学术史的时间流动概念，这很有意思！

德里达法文版的 *De la Grammatologie* 是 1967 年于法国巴黎子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出版的，斯皮瓦克英译的 *Of Grammatology* 是 1974 年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而汪堂家从法文汉译的《论文字学》是 1999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我注意到英译本与汉译本使用的都是 1967 年巴黎子夜出版社的那部初版。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为接受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在历史背景及其适应性的准备上，整整延宕了 30 多年。

我想提醒的是，德里达联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拉康（Jacques Lacan）在 1966 年掀动了挑战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思潮，他的代表作《论文字学》直到 32 年后才被翻译于汉语学界，随后即在中国人文学界产生了漫天卷地效仿解构主义声音的那些嘶声呐喊。我于 1995 年前后阅读的就是斯皮瓦克的英译本 *Of Grammatology*。<sup>①</sup> 在阅读这部英译本时，让我非常惊诧的是，斯皮瓦克在翻译完这部法文著作后，以其理论生命的介入性体验，撰写了一篇总共占据 81 页之结构宏大的“前言”，准确且体系化地阐述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学术沿革历史脉络及其理论的底层逻辑结构。准确的翻译是一种体验性的深度阅读，而让我感到神乎其技的是，可以说，斯皮瓦克这篇“前言”是以结构主义观念浓缩地阐述了解构主义的理论，是把两种思维观念并行同步于一个话题的逻辑陈述中的。无论如何，其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且深刻的。

在《超越后现代主义》一书的第三章《后殖民理论与文学》，王宁在讨论“三种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剖析”时，其中也专门提及了斯皮瓦克关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英译问题：

如上所述，后殖民理论本身也呈现出其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理论的差异性，它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尝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在几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美国印度籍女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早年曾以翻译介绍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大家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著述而出名，曾被认为是

① 按：1995 年前后，我在阅读斯皮瓦克的英译本 *Of Grammatology* 时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忘却。作为解构主义的经典理论文献，我在阅读与引用德里达的这部著作时，使用的是斯皮瓦克的英译本，以示对斯皮瓦克的敬重。翻译在转码的对等阅读本质上是一种理解与解释。从阅读此部英译本，我可以见出斯皮瓦克在翻译的理解与解释中所生成的思想性判断。这很有趣！再较之于法文源语本，我给予法英互读时，还从中可以获取在两种同源拼音语言及其文本的互文性转码中出场的互证学理想。这很有启示！此时，倘若再同步阅读汉译本《论文字学》，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学术感受。《论文字学》的汉译者汪堂家教授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英年早逝，我们也曾是朋友。在此特向他致敬！

后结构主义理解最透彻、把握最准确的一位学者，又由于她的印度人后裔的特殊身份，因而她的理论带有强烈的解构主义和第三世界色彩。<sup>①</sup>

这是中西学界的一个共识，因斯皮瓦克英译德里达的 *De la Grammatologie*，并撰写了鸿篇巨制的《前言》，多位学者从而判定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底层逻辑就是对解构主义之底层逻辑的介入性挪用。

赵稀方在 2000 年刊发的《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一文中，也曾持有这一判断立场：“后殖民理论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话语理论为基础的，旨在解构西方霸权的文本系统，揭示隐含于西方历史知识中的权力结构。”<sup>②</sup> 赵稀方的后半句判断无疑是正确的。这里有一个关于西方历史传统总体知识判断的立场问题：隐含于一部西方历史知识传统中的权力结构是在场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还是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呢？其显然不可能是后者！

1998 年，时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温儒敏建议我翻译 *Postcolonial Criticism*（《后殖民批评》）这部论文集，这部论文集是由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 M. Gilbert）主编的。我即邀请了毛荣运和刘须明三人合作翻译。这部译作 2001 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我受斯皮瓦克的影响，撰写了一篇长达 48 页的《译者序：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追溯》<sup>③</sup>，以系统地追溯西方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发展史及对其进行抵抗性批评的学术史。随后我逐渐发现后-殖民批评的底层逻辑与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在理论结构上全然是无法动态功能对等的。倘若仅操用“中心”与“边缘”、“颠覆”与“解构”等概念在两者之间人为动态地寻找相似之处，给予“比一比”，那只能是浮泛于双方理论之若干组术语的符号表象上，给予非本质性的硬性比较。

我把斯皮瓦克撰写的著作与文章一路翻阅下去，特别感佩她对西方学界及其学者从不谄谀献媚的人格魅力，赞赏她以张力性书写的风格对西方学界及其学者所抛掷的贬损性批判。尽管斯皮瓦克是一位女性学者，但我从来认为她就是国际学界的一条倔强的“好汉”。关键在于，斯皮瓦克的论述中，她全然没有也无法把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及其相关一套术语，准确地内化于她所涉论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第三世界区域文学研究及文化研究等书写中。只要是真正懂理论的学者，或理论文献功底扎实的学者，就不难给出如下判断：从解构主义的底层逻辑构成及其挑战的在场形而上学来给予判断，那也是不可能的！

关于国际学界所讨论的斯皮瓦克与德里达之间在学理上所存有的暧昧关系，让我们从一段文献上来视读斯皮瓦克自己的宣称。

在《批评、女权主义和制度》一文中，斯皮瓦克有如此以下的对话式告白：

我认为我在某些方面上避免了成为接受一位大师话语的人，我总是很好笑地看到，正如你所说，我可能是最为著名的关于德里达的翻译者和评论家，因为我认为解构主义会发现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所以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是特别有兴趣去捍卫德里达作为一位大师的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发现那只是偶然的兴趣，我不可能在德里达的实质性学理中追随他。<sup>④</sup>

斯皮瓦克的告白掷地有声：“我不可能在德里达的实质性学理中追随他。”如此而言，学界还有什么可以侈谈的呢？

准确地分析，我们透视萨义德抵抗西方之东方主义话语的批评立场，他也有自己所欣赏的西方学者，那就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而不是德里达。并且在批评的方法论上，萨义德深受米歇尔·福柯论述知识与权力关系所构成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关于这一立场，他在 *Orientalism* 的“序言”中有着确切的表白：“在这里，我发现采用米歇尔·福柯于《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所描的话语概念，来以辨识东方主义，这是非常有用的。”<sup>⑤</sup>

① 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第 41 页。

② 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文艺争鸣》2000 年第 5 期。

③ 杨乃乔：《译者序：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追溯》，见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48 页。

④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Elizabeth Grosz, “Criticism, Feminism, and the Institution,” i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6.

⑤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78, p. 3.

同时，我们透视萨义德批评姿态的理论构成，不难视见他又频繁地操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对西方殖民主义策略及其东方主义话语给予激烈的反动：

葛兰西对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进行了有益的界分，前者由自愿的（或至少是理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联盟所组成，如学校、家庭和工会，而后者由国家机构（军队、警察、中央官僚机构）组成，其在政体中的作用是直接统治（domination）。当然，文化是在公民社会中运作的，在公民社会中，思想、制度和其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统治发挥作用，而是通过葛兰西所说的“同意”（consent）发挥作用。因此，在任何非极权主义（not totalitarian）的社会中，某些文化形式支配着其他文化形式；正如某些思想比其他思想更有影响力；这种文化领导的形式就是葛兰西所定义的霸权（hegemony），这是一种理解工业化西方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概念。<sup>①</sup>

在准确地分析萨义德对殖民主义及东方主义话语批评的底层逻辑后，向我们真切显露的，那就是地缘政治学与文化批判是其中两种最为基本的面向。因此，从理论介入的有效性来看，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最为恰如其分带入其中运用且展开的，因为双方批评理论的底层逻辑是可以通约的。关于这一点，中国学者王宁与赵稀方等都有所认同。事实上，这对于比尔·阿什克罗夫特、斯皮瓦克、罗伯特·扬与霍米·巴巴等接续造势的后-殖民批评来说，也是如此。因此，萨义德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位袭承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者，在双方理论的底层逻辑上，德里达与萨义德不可能是坝麓相和且燮和天下的同道知识分子。

关键在于，中西学界把西方哲学在本体论上所猜想的源起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概念上替换为 15 世纪末以来殖民与后-殖民历史阶段发生的西方中心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这两个时期在历史上至少相差了几千年。学术往往也就是如此拼贴而来，终于酿成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国际学界的学术思潮，多少知识分子劳顿其中，且为之付出了艰辛的思想智慧与无畏的批评勇气。

（责任编辑：张曦）

## Between Derrida and Said

—— On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 Underlying Logic between  
Deconstructivism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YANG Naiqiao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have brought Derrida and his deconstructivism into the discussion of Said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Here we provide a condensed overview of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deconstructivism.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out that deconstructivism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re far apart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ir underlying logic, which can be verified by ampl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Deconstructivism challenges the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ical issues regarding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in the noumenal world, while post-colonial criticism resists the empirical geopolitical issues forced by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uzerains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world. A practical question could be asked: What is the “center” to be “deconstructed” b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We do not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we simply grasp the logocentrism and ethnocentrism (人种中心主义) penetrating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substitute Western-centrism and ethnocentrism (种族中心主义) in Western colonial or postcolonial history for them, the academia can determine that post-colonial criticism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Derrida’s deconstructivism, and therefore identify deconstructivism as the Archimedean point of Said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This is undoubtedly a mutual misreading of Said and Derrida.

**Key words:** Said, Derrida, deconstructivism, post-colonial criticism, the underlying logic

①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78, pp. 6-7.